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意义

毛林科, 韩平¹, 吴小军²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奠定了我国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石和战略基础,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 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等方面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重要方法论意义, 彰显出强大的理论光辉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 毛泽东; “三个世界划分”; 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1)02-0047-07

DOI:10.13967/j.cnki.nhxb.2021.0022

21世纪以来, 国际形势、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国际政治环境实质上并没有改变, 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基于新的时代背景, 再审视“1840年以来, 孕育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逻辑之中, 诞生于战后国际社会动荡、分化、改组的深刻历史变革之中”^[1]的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它不仅可以为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新变化提供滋养, 而且可以从中汲取大国外交的思想精髓和战略智慧, 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 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中增强“识别力”, 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与定力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2]。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历史的珍视者、爱护者, 而且是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践行者。所谓大历史观, 就是指以历史视野、国际视野和知识视野来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指出其发展必然趋势的历史观^[3]。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表明, 只有从大历史观出发, 我们才能以更宽广、深邃的视野观察历史, 客观、全面地呈现历史, 科学、公正地评

价历史, 准确揭示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规律与趋势。

二战结束后, 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 美苏各自为营, 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呈现出尖锐的冷战对峙局面。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国际形势和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 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他说: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 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 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4]59} 毛泽东认为, 世界历史理应由各国人民共同主宰, 世界各国不应被美苏对峙所迷惑, 被压迫民族和地区应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掀开各国历史 and 世界历史新的篇章。20世纪50年代中期, 毛泽东又作出“两类矛盾, 三种力量”的论述, 他认为世界的矛盾可以分为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及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 世界上存在着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二等帝国主义英、法以及被压迫民族三种力量。历史的发展是不被人们的愿望和意志所左右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 中苏关系日趋恶化, 中国面临来自美国、苏联等多方安全威胁, “中间地带”理论和“一边倒”政策都已不

[收稿日期] 2020-08-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专项“培养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和主要途径研究”资助(编号:20VSZ068);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优秀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新时代伟大斗争研究”资助(编号:20B516)

[作者简介] 毛林科(1984—), 男, 湖南韶山人,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文博馆员。

¹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²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只能放入历史的“收纳盒”。针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毛泽东将中间地带划分为具体的两个中间地带。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4]508}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客人谈话时再次指出:“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345} 即在美苏之间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苏联加剧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则有所收缩,苏联成为对中国、世界和平安全的最大威胁。毛泽东依据各国经济情况、受压迫情况、反霸权情况将国际格局、国际政治力量进行了进一步区分划界,在“中间地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5]441}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5]442} 可见,深刻变化的国际社会主要矛盾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是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重点考虑条件。毛泽东冷静地分析国际形势变化,把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放进“世界历史”,认清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被美国、苏联称霸世界的意图迷惑,审时度势地调整外交政策方针,牢牢把握住推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动权。

人类社会将如何发展?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有预言。他们认为,由于新兴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商品生产,拓展商品销路,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以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6] 换句话说,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都主动或被动的卷入了世界市场,所有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资本逻辑主宰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逐步实现了“全球化”。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昭示了人类社会终将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基本规律不但没有变化,

而且愈发清晰。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人们选择和接受着世界各地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世界交往,人类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正如习近平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272}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更加扑朔迷离,国际现象更加纷繁多变,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甘在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的大潮中丧失其霸主和强势地位,他们肆意妄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断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发动贸易战、新冷战,导致国际社会险象环生。当前,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军备竞赛等各类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逆全球化、多极化因素增多。面对云谲波诡、纷繁复杂的国际新变化,习近平强调:“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8]414},“要坚持大历史观”^[9],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增强国际“识别力”,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使出各种“邪门歪招”,无非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而进行的“挣扎”,他们既无法阻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也无法阻挡人类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历史将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中国。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建设者、捍卫者,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者、维护者,始终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一道携手合作、同舟共济,肩负着负责任大国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担当。

二 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在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扩大“影响力”,争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国际环境

不同国家的人民有权利依据本国国情选择或遵从不同的社会制度,国与国之间客观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矛盾不可避免。坚定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维护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前提。战后两大阵营对峙时期尤为如

此,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曾长时间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的突破口,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较多的国际资源。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并日趋恶化,中国面临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和东方大国沙文主义的双重安全威胁。怎么办?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出发,团结和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来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时强调:“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4]520}“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合作。”^{[4]210}也就是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是可以合作的,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同年,毛泽东在同日本朋友谈话时再次提到:“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保卫世界和平。”^{[4]519}正如毛泽东所言,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不能和平共处的前提是“双方愿意”。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平,珍惜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7]265}。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战争摧残和动荡折磨,孜孜以求和平安定的生活。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发展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4]168}“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4]17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搁置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提出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战略,呈现出“一个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和平共处”→“三个世界划分”→“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图式。事实证明,从冷战时两大阵营的对峙,到苏东剧变、一超多强局势的形成,再到多极化深入曲折发展,无论世界局势和国际力量对比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举和平旗帜,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

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7]249}。然而,总有一些国家利用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别有用心地扩大分歧、制造事端,破坏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缓和国内矛盾,西方某些大国一方面借以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说广开药方,企图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所谓的“优势”,美化“自由”“人权”“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不断妖魔化、边缘化社会主义制度,炮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奇谈怪论,疯狂地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随着中国发展的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更是加紧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围堵,乐此不疲地推销“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等抹黑唱衰中国的歪理邪说,利用现有国际秩序和信息技术优势,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争夺话语权。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未放缓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从未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从未放弃扰乱社会主义秩序的图谋。对此,毛泽东曾指出:“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4]161}

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歧,不是说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不闻不问或视而不见,而是要坚定地抓紧抓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对于敌对势力的颠覆分裂行径、错误言论要迎头痛击,坚决斗争。史实一再证明,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苏联亡国、苏共亡党就是例证。如果不重视意识形态斗争,思想防线被攻破,西方的思想观念就会大行其道,就会导致执政党组织体系分崩瓦解,国家政权倒塌,社会主义制度倾覆。习近平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0]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全面深刻地揭露西方各种奇谈怪论、歪理邪说的真实面目。当然,中国始终坚定地支持各国人民自由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不搞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输出,也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模式。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或以武力相威胁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政权的行为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世

界各国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携起手来共同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7]265}。我国要广泛深入宣传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积极争取国际舆论话语权和主动权,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发展,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中国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发展既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也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

三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扩大共识和增进认同中提升“凝聚力”,壮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力量

毛泽东指出:“历史和现实要求我们团结,合作。”^{[4]215}“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4]482}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力量,是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本依据,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的外交智慧和战略眼光。

二战结束后,与近代中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经历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了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第三世界与贫穷、愚昧、疾病和战争划上等号,认为第三世界是“低三下四地乞求施舍的乞丐国家”的时候,毛泽东则多次强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不管是已经独立的,还是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都是中国的朋友。毛泽东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受殖民压迫剥削越深,第三世界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寻求和平的呼声就越高。只要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就能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力量的对比,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就要“注意一点”。因而,中国可以带动和引导第三世界为改变民族历史而奋起抗争,打破旧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体系。第三世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关系决定的”^[11]。不仅仅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还主张:“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

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5]386}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是中国的朋友,团结和支持的对象。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明确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且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产阶级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加快建造一个“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人类社会实质进入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化”运动中。在这样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背景下,中国的自我定位过程充满艰辛。晚清政府的衰败无能,导致中国在国际上“失位”;国民政府时期,外交上仰仗西方势力,后期又唯美马首是瞻,造成中国在国际上“软弱可欺”;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才真正实现自我定位。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把中国划归第三世界,不仅明确了中国的国际定位和历史方位,而且突破了传统的世界政治力量划分标准,使得国家利益凸现出来,使得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有更多的认同因素,深厚了第三世界合作的利益基础和情感基础,强化了第三世界团结意识。正是毛泽东这一突破传统标准划分国际政治“三个世界”的做法,“赋予了第三世界作为反对霸权统一战线设想的政治弹性,甚至可以将第二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组织’在新的‘合作平台’之上,拓展了中国新的外交空间”^[1],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外交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凝聚力。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 and 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1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关乎全人类七十亿人口及其子孙后代美好未来的伟大工程。与其他伟大的蓝图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面临着来自守旧势力、历史惯性、思维定势等的顽固发难、抵制、阻挠,不可能靠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为之不懈奋斗。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13]世界各国理应积极推动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

互帮助,增强共识,形成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进入新时代,第三世界中的很多国家成为新兴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他们的国际地位与他们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常常难以在现有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中发声和维权,他们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的追随是最笃定的,依然是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力量。习近平认为,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步骤或者路径选择,并主张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集体对话机制重大活动的全覆盖。中方主办的一些重大主场外交,也是发展中国家担当“唱主角”。与此同时,中国多次重申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承诺永远不结盟,不称霸,不当超级大国,不仅对别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永远不会构成威胁,而且让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给予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凝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力量。“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汇聚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磅礴力量,继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不懈努力,切实承担起促进世界和平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历史使命。”^[14]

四 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提高“战斗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世界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8]487}。20世纪以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人类前进的最大阻碍。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逻辑和核心要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认为这一阶段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是美国霸权主义;20世纪60年代,苏联走上了霸权和扩张之路,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苏霸权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中间地带国家应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和苏联霸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承继反霸权主义思想,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明确苏美霸权都要反对,重点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毛泽东一贯主张:“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

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4]590}世界各国必须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坚决的斗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且以更多新的形式展现出来,开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斗争更具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资本主义大国成长发展路上的“法宝”,马克思直言,“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极大的作用”^[15]。长期以来,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倚靠自身强大国力在国际上唯我独尊、耀武扬威,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所谓“民主制度”,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发动颜色革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和道路选择,动辄以莫须有的理由发动战争侵犯弱小国家的权益。在国际事务中,唯我独大,无视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及别国利益,并以停止援助或给予制裁措施强制各国站队自己一方,对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以及国际法持合则用、不合则弃,甚至明目张胆与之背离的态度。在霸权主义笼罩下,和平安定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奢望,国际社会形成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弱小国家为此叫苦不迭,深受其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践踏人类文明和道德的底线,与人类共同利益和美好愿望相去甚远,将注定不能得逞。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1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间地位、机会平等。任何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也应是平等的国际交往主体。无论大国小国都应享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国与国之间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各国应充分尊重别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传统、道路选择、制度选择。大国不能因为自身国力强大而一国独大,任意妄为,搞民主制度、价值输出,肆意侵犯小国利益,称霸全球。国与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包容互助,和谐共存,应坚持用协商对话的方式化解矛盾,缩小分歧,减少误判,凝聚共识,共同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勇担责任,使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

星球变得更加美好。

斗争的目的不是斗争本身,不应为了斗争而斗争,斗争的出发点是求团结求生存求合作求共赢,斗争的落脚点也是求团结求生存求合作求共赢,要坚持团结——斗争——团结的路线和原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领域,对风险、挑战、困难开展斗争的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携手共建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梦想,坚定斗争意志,对一切影响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言行举止敢于亮剑敢于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1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点是整个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美好未来,它一面世就站在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它顺应时代的潮流,它符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愿望,所以我们要对它的践行和实现抱有充足的必胜的信念,要充满信心,充分发扬斗争精神,不信邪不怕邪,要敢于勇于跟一切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思潮、观念、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人类公平、正义、共同利益。

要善于斗争,把握好斗争的度。要全面综合评估事因事态,采取合适的斗争形式,避免因斗争而导致事态升温,甚至走向不能挽回的战争状态。但斗争形式太过柔和也起不到实质的作用。斗争的形式有多种,如法律手段、外交层面严正交涉、同等措施公开反制;公开批评声讨;军事对峙等。这些斗争形式在我国处理外交关系过程中也经常运用。比如,为反击反中乱港分子与外部势力相勾结开展暴力恐怖活动试图分裂国家的行径,我国制定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维护国家的安全;美国要求我国关闭驻美休斯顿总领馆,我国迅速作出同等措施反制,即要求美国关闭美驻成都总领事馆;我国国家领导人经常在国际会议的演讲中或是在他国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时公然表明反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霸权主义、保护主义等;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批评某些国家的不齿行径;面对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中国也相继列出了反制清单……。总之,开展斗争前要综合全面认真评析斗争对象的特点,采取科学有效的斗争手段,发挥

斗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

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历史大时代。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全人类利益和未来发展的高度,主张包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主张每个国家依据自国国情有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权利,任何国家应充分尊重各国的制度选择和道路选择,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干涉。求同存异,共存共荣,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互利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理念和态度。所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仅要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进行斗争,还要学会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合作,与其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决不允许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开展意识形态渗透,而是要将输出活动斗争到底,坚决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 [1] 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4-26;206.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20.
- [3] 严书翰.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J].新视野,2020(4):19-23;80.
- [4] 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9]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2).
- [10]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3.
-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6.
- [1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6.
- [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12.
- [14] 携手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主持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

- 满成功和丰硕成果[N].人民日报,2018-09-07(1). 民日报,2014-03-30(2).
-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21. [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6-227.
- [16] 习近平.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人

The Epochal Value of Mao Zedong's "Three World Theory": an Analysis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MAO Lin-ke, HAN Ping, WU Xiao-ju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Three World Theory" has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strategic foundation for China's great power diplomacy and has given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adhering to the Marxist view of history, transcending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 differences, uniting all forces that can be united, fostering the spirit of daring to struggle and being good at it, which shows the powerful theoretical brilliance and epochal value.

Key words: Mao Zedong; "Three World Theory";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construction

(本文编辑:刘衍永)